

## 明清陕西商洛成为移民聚居区的原因探析

王秀绒 杨增强 李雪峰 许 博  
(商洛学院人文社科系, 陕西 商洛 726000)

**摘 要:**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洛是一个移民聚居区, 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既与移民迁出地的政策、社会、政治、自然等因素的“推力”有关, 也与商洛区域内气候、交通、人文、政策等因素的“拉力”有关, 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政府的移民奖励政策则推动了这一进程。移民聚居区的形成给商洛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全面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本课题对于商洛正在进行的移民搬迁工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明清; 商洛; 移民;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移民的概念,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作了界说。葛剑雄先生所下的定义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 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sup>[1]</sup>。依据这一定义, 明清时期的商洛是一个移民聚居区。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 秦岭东段之南, 地辖商州及洛南、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柞水七县、区, 跨长江、黄河两个流域。现之自然经济区域属秦巴山地。

明清时期, 贯穿于川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秦巴山区, 尤其是以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为主体的广袤山地是大移民的重要地区。<sup>[2]</sup> 移民商洛是“湖广填陕西”的组成部分。从商洛的地方史志和现存碑刻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移民盛况。“《商洛文史》第二辑中共收碑文墓志文 132 篇, 总共涉及 176 人。其中祖籍不在商洛的, 仅墓志中明确记载或可以根据其他史料推断的就有 110 人, 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二, 可见商洛人口中的外来人口比例大得惊人”<sup>[3]</sup>, 是名副其实的移民聚居区。

### 一、迁商移民产生的原因

迁商移民产生的原因很复杂, 或者是源于某一种因素, 或者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 (一) “狭乡”迁往“宽乡”——移民产生的

#### 政策因素

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定都金陵(今南京)后, 中原地带十室九空, 人口稀少, 大片耕地无人开耕, 生产力低下, 经济凋敝; 而山西却凭借相对封闭的地理优势和骁勇多谋的扩廓帖木儿的严防, 战乱极少波及。加之元末明初, 山西风调雨顺, 人丁兴旺, 吸引着临近省区难民的归依, 造成山西人口猛增。据《明洪武实录》记载, 洪武十四年, 山西总人口 403.4 万, 超出冀豫两省的总和。山西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7.52 人, 超出北平近一倍。<sup>[4]</sup> 显然, 山西人口的再生产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比例严重失调, 仅有的耕地面积难以承载和养育庞大的人口。明政府为加速自然资源开发, 发展生产, 增加税赋, 将山西多余的人口迁移至与之相邻的河南、陕西以及其它地广人稀的地区。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 政府在山西省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设立移民局, 大量征集移民, 办理移民手续。自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 陆续有移民迁居商洛, 习称“大槐树人”, 这是商洛历史上较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新编《山阳县志》记载:“明洪武后期及永乐年间, 先后有山西移民进入山阳。明成化年间, 这些‘大槐树人’, 在县城东街修建‘山西会馆’, 主神位塑三国时山西解州人关羽像。以倡忠义互济, 防范异

收稿日期: 2013-03-15

基金项目: 2011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移民聚居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以明清时期的陕西商洛为例”(项目编号: 11J048)

作者简介: 王秀绒(1966—), 女, 陕西大荔县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商洛地方史。  
杨增强(1962—), 男, 教授, 研究方向: 商洛地方史、中国文化史。

乡欺凌”。<sup>[5]85</sup>新编《丹凤县志》载：明初由山西大槐树移民局介绍多次迁徙到丹凤县境内的移民有数十个姓氏。<sup>①</sup>

## （二）战乱兵燹——移民产生的社会因素

明政权建立后，大批经战乱兵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元末农民起义军为谋求生计，或逃避赋役官差，在荆、襄、川、陕、鄂边区的秦巴老林辗转流浪。明中叶以后，江浙及中原富庶地区的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流民问题也日益严重。明景泰年间（1450—1457），秦、楚、豫、蜀四省饥民纷纷进入荆襄山区垦荒，遭到明政府的禁止与镇压。成化元年（1465），刘通在湖北房县起义，活跃于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荆襄和秦巴山地，扼险设伏，屡败官军。成化六年（1470），明廷调集重兵 25 万，对起义饥民进行血腥镇压，但大部分饥民为了生存，仍冒死进山垦荒，明廷深以为忧，乃命南京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安抚。此时流民思安，愿听编户。原杰奏准朝廷在陕南安康、商洛两地及湖北郧西增设山阳、商南、郧西、白河等七县，安置流民。据清王廷伊《续修商志》载，到明万历年间，商州军民杂户增至三万余，呈现商洛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高峰。<sup>[6]132</sup>

## （三）“圈地”运动与迁海令——移民产生的政治因素

清顺治、康熙年间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圈地”活动。最初，只圈占“无主荒地”，后来发展到“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圈占；先是在京畿三百里以内，后来“三百里不足，则远及五百里”；原来主要圈占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土地，最后一直扩展到山东济南、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太原、潞安、平阳、蒲州等处。被圈占地区人民失去土地田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加入到原已存在的流民队伍。在这些流民中，相当一部分辗转流徙定居于陕、鄂、川各地。其中，流徙于陕南商洛的流民数山西籍最多。清代移民凡“山西大槐树人氏”多为圈地受害者。“1985 年调查，清代初期，由山西大槐树迁入山阳的计有 20 多姓。主要分布在城关镇和色河、三里、五里、十里、过风楼、高坝、黄土包、洛峪、中村、银花等乡镇的川道地带。”<sup>[5]85</sup>

福建、广东等濒海居民进入内地的主要原因是清初强制推行迁海法令。清初，在东南沿海，以前明将领郑成功为首的反清义军不断发动对清作战，给清朝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抗清斗争从顺治四年（1647）一直蓬勃发展到顺治末年，为切断郑成功义师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发布迁海令，强制把濒海六省居民迁

入内地。至康熙继位，进一步推行《迁海令》。执行最严的是福建、广东、浙江三省，限期三天，不迁者即强行驱赶，界外房屋全部焚毁，弃为灌莽，有敢出界者格杀勿论。在此情况下，少数强悍者铤而走险，偷渡过海，旅居南洋，多数则被迫迁徙内地，很多人因此而迁居商洛。商洛至今仍有“解手”方言。据传：清廷下令“湖广填陕西”，人们都是被捆绑押送而来，途中如需大小便，须请求解开手上的绑绳，小便解一只手，称“小解”，大便解双手，称“大解”。由于道路漫长，数月乃至累年才能到达，后来就逐渐习惯用“大小解”代称大小便。这些民间口头记载，虽然缺乏文字的考证，但它对清初强制迁徙濒海居民这一史实不无参考价值。

## （四）连年水灾——移民产生的自然因素

湖广、江南之民流徙商洛的主要原因是水灾。据《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载：顺治十八年间，湖北遭受洪涝灾害达 14 次之多，被灾范围达 93 州县（次）。康熙年间被灾面积增至 283 州县（次）。江西、安徽也是水旱灾害频仍，流民成群结队，以致形成“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的”的局面。<sup>[6]133</sup>清代广东的自然灾害是其历史上最多的，发生的频率为每年 9.28 次，远远高于宋、元、明时期。新编《镇安县志》载：“清乾隆三十年（1765），豫、鄂、湘、皖、赣等省灾民相继入境，使镇安人口增至 15.98 万人，为历史上第一个人口最多的年份”。<sup>[7]92</sup>新编《山阳县志》载：“康熙、雍正年间，众多湖广灾民星散进入金钱河上游，在鹤岭南麓定居。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采取强迫手段，将江淮流域灾民（包括流民）驱赶到陕南山区。当时迁入山阳的新附之民，湖广、江南、河南共 2000 余户，江西、福建、广东共 100 余户，大半只身结伙，赁房侨居，或带家小，稞买田地，筑室栖止。”乾隆末，时任山阳知县的湖北钟祥人何树滋，为同乡所请，于县城东关修筑“湖广会馆”（即禹王宫），与“山西大槐树人”所修之“山西会馆”遥相呼应。<sup>[5]86</sup>

以上主要是分析迁居商洛的大规模移民产生的原因，至于零星、分散迁居商洛的移民，其产生的原因更加复杂，这里不再分析。

## 二、商洛成为移民迁入区的原因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而产生的移民，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部分移民或自愿或被迫迁入商洛。商洛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移民迁入区，是因为商洛具有吸纳移民的有利条件。

### （一）地旷人稀——移民迁入的地理因素

元末明初，本来就不多的商洛人口减耗相当严重。由于人口大减，洪武七年（1374）降商州为

县。<sup>[8]369</sup>明末,商洛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游击根据地,农民军“八进八出商洛山,驰骋往来无虚岁”,陈奇瑜、洪承涛、杨嗣昌、丁启睿等历任总理陕、晋、豫、楚、川五省军务的明廷督师,都曾率官军在商洛山及其周边地区经年对农民军进行剿抚,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之久。<sup>[9]186</sup>清初,又有农民起义军白莲教首领王聪儿率军征战商洛。

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口伤亡是极其巨大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攻陷商州,“杀男、女四万七千,文武官俱殉难,公私屋宇焚十之七”<sup>[10]222</sup>。明万历时“商州有军民杂户三万有奇”。但至“明末仅存7015户,康熙初也只剩下3512户。”<sup>[10]102</sup>说明战争造成了二万六千多户的流失或伤亡。洛南县“劫烧无遗,人民百存一二而已”<sup>[11]484</sup>。山阳县“明代编户为20里,顺治二年,以兵燹之后,凋耗无几,攒东西二里”<sup>[12]101</sup>。长期的战乱给商洛的农业生产也带来极大的破坏,王廷伊《续修商志》卷四“土田”记载,明万历年间,商州原地为1649顷38亩。顺治七年九月和八年十月奉旨免过的无主荒地596顷,有主荒地213顷,二项合计荒地总数为809顷,<sup>[10]103</sup>榛芜土地将近半数。这种地旷人稀的状况对外来移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二)赋税较轻,地租极低——移民迁入的经济因素

据文献记载,陕南“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亩数岭”。清人严如煜说:“山内地广赋轻,……缘当国初定赋之时,多系未辟老林,故率从轻科。”“国初定赋,人户荒凉,原定之额不能符数,土著百姓以纳课为难,募人领地承赋,其承纳之国课不过几钱几分,领地辄广数里,至离县远者,一纸执照之内,跨山逾岭,常数十里。完课既为无多,故其赁佃之租,亦不似外间之按亩而定也。”<sup>[8]378</sup>商洛赋税之轻、地租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三)气候适宜,水量充沛——移民迁入的气候因素

商洛位于秦岭东南麓,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这里山川河谷、风土人情,兼北方粗犷,融南方灵秀。这里山清水秀,具有北亚热带到温带气候特点,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北有秦岭主脊屏障,干冷空气不易侵入,向东南走向的掌状山川地势,有利于东南湿热气流北上入境,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13.1℃,年均降雨量为775毫米,无霜期200天。本区大部地区处于南坡,年辐射量大于120千卡/厘米,<sup>[26]111</sup>光照充足,适合南北各地人民生活。

(四)“宾至如归,主无欺客”<sup>[8]379</sup>——移民

迁入的情感因素

商洛人以他们的质朴、善良、热情、诚实吸引着外来人。事实上,商洛当初并不是移民首选的迁居地。他们当中的许多家庭都有过一迁再迁甚或三迁四迁的辗转颠沛经历。一些家庭经过反复考察对比,周详盘算之后,才最后决定在商洛落脚。如洛南油房湾村的移民吴玉伦,先曾祖以贸易为业,“偕两叔曾祖一迁应城,再迁于商南山,三迁于洛邑。相其土宜,观其风俗,遂居焉”<sup>[13]217</sup>。镇安云盖寺镇烽岩村移民胡德彦,祖籍安徽潜山,乾隆二十一年迁居霍山,十二岁时随父再迁至湖北房县,又三年始迁至镇安岭古泉。<sup>[13]309</sup>移民最终定居商洛的原因,镇安柴坪镇东瓜滩移民《潘显忠、王氏碑志》中有这么一段话,归结的理由很具体、客观,主要是“爱其土塬、水深,俗远、淳朴,遂家焉”<sup>[13]330</sup>。

(五)秦岭的天然屏障——移民迁入的安全因素

商洛位于秦岭山区,秦岭山地不仅森林茂密,拥有陕西最大的林区(面积达到700多万亩),而且还有许多山间平台和小盆地,商洛的商州区、洛南、丹凤等都位于这些小盆地中。秦岭较高的山峰和重要关隘很多,属于商洛的有:位于洛南洛河河源之南,商州与丹凤县之北的蟒岭,主峰海拔1744米,周围有云架山、娘娘山、五峰山、老虎岭、七宝山、马龙山等诸峰拱卫,控扼着丹江河谷;位于商丹盆地之西的流岭,海拔1678米,控制着商州、山阳、柞水、丹凤四县的往来交通;位于丹江及其支流银花河南侧的新开岭,海拔1500米左右,周围亦有天竺山、竹林关等峰环绕。因为有秦岭的屏障作用,商洛虽然也曾沦为战场,但几率毕竟较低,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安全的地区。

(六)水陆交通便利——移民迁入的交通因素

商洛北临潼关,南通巴蜀,东连中原,西达长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为京畿长安的东南门户。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关中平原通汉沔线、岭南线,还是秦汉时的咸阳至岭南道、闽中道,还是唐时的长安至四川道、岭南道,无不从商洛经过。秦始皇巡回咸阳从商於古道经过。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曾驻军洛南和商州,西进蓝田,赶走了占据长安的吐蕃军队。至于取道商州南下荆楚,西趋长安的知名人物更是数不胜数,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杜牧、王维、李商隐等,无不留下吟咏商山丹水的隽永诗篇。境内还有丹江水运与江南地区相通。丹江是汉江的最大支流,源于秦岭南麓,向东南流经商州区、丹凤县、商南县,然后经河南淅川、湖北均县汇入汉江,全长443公里,在商洛境内约240余公里。丹江航运历史悠久,公元783年,唐德宗被

围困奉天,江淮一带的贡赋被阻于开封不能西上,当时就靠长江—汉江—丹江航线将江淮物资上运,然后再由陆路运到奉天。丹江航运以明清时最为发达,清初,关中屡遭年荒,东南赈济粮食主要是靠丹江运送。由襄阳水运到龙驹寨(今丹凤县),再陆运到西安。历史上曾称龙驹寨为“水走襄阳,陆入关辅”的水旱码头。此外,还有洛河等河流于秦岭中部诸峰中纳溪融流滚滚东去。南北各地的移民大多是沿着这些古道进入商洛的。

### (七)商洛地方官的招抚与惠民政策——移民迁入的政策因素

商洛四属各县的历任地方官员积极推行惠民政策,劝垦助耕,济弱恤残,“极尽培养招徕之道,故杀伤渐补,榛莽渐开”。首任山阳知县赵信到任伊始,大乱大治,招抚流民,安居乐业,“相其地,询其革”,创建山阳县城。<sup>[6]755</sup> 顺治九年商州知州刘正“一意招徕,与民生息。倡修龙驹寨,通商惠工,设戍防守。由是农桑大兴,盗贼屏迹”。乾隆十三年任镇安知县的聂涛,招抚流民入境,奖励垦荒种田,不摊派税捐。这些地方官员的招抚与惠民政策,不仅使清廷的休养生息国策能够在商洛得到普遍实施,而且也吸引着外来移民的迁入。

商洛既有秦岭的天然屏障,又有便利的水陆交通,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民风淳朴。更重要的是,战后这里“地广税轻,开垦易以成业”,又有亲民爱民的地方官,因而成为移民迁入的比较理想之处。

### 三、朝廷移民鼓励政策的推动

明初“狭乡”迁“宽乡”时曾号召地方官吏带头移民,并给以种种优待。推行移民鼓励政策最多的则是清初。清廷在战乱平息不久,为避免土地撂荒,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政权,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川陕,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招徕外省流民进山垦荒就食。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正式颁布《垦荒令》宣称:“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言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视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清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金派差徭……务使逃民复业,田地垦辟渐多。”<sup>[2]71</sup> 顺治十年(1653),陕西“镇安等州县,田多荒芜,官给牛种招垦”。康熙十二年(1673),朝廷对陕南实行薄税政策,明令新垦之地十年后“方行起科(开始征税)”;乾隆六年(1741),颁布陕西省荒地应行开垦并酌议招垦事宜六项,其中包括“商州及所属隙地三万余亩,可以开垦,……

无主荒地由官招垦,有主自认无力开垦者,酌定价值招垦,给照为业。如三年不垦地,又不请价者追照存案,另招所垦之地照各地方土,宜三、四、五亩折征一亩不等,限十年起科”<sup>[1]172</sup>。以上招垦政策的实行,降低了移民成本,推进了移民迁商运动。

总之,明清时期,由于内因、外因,自然原因、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南北移民或自愿或被迫迁居商洛,使商洛成为移民聚居区。移民聚居区的形成必然给商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 注释:

①关于明初由山西大槐树迁徙到丹凤县境内的移民姓氏,据《丹凤县志》记载有赵、田、董、屈、米、李、冯、姜、戴、宋、孙、白、范、王、邓、傅、淡、史、席、巩、张、刘、韩、卢、何、段、梁、童等姓氏。

### 参考文献:

- [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2]陈良学.明清川陕大移民[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 [3]王培峰.碑刻文献与商洛移民史[N].商洛日报,2009-09-12.
-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5]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阳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 [6]商洛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商洛地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2.
- [7]镇安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镇安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
- [8]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
-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六辑)[M].商洛:内部发行,2007.12.
- [10]陕西省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康熙续修商志注[M].商洛:内部发行,1986.
- [11]商洛地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直隶商州总志》点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12.
- [12]陕西省山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山阳县志点释[M].商洛:内部发行,1985.8.
-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洛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商洛文史(第二辑)[M].商洛:内部发行,2003.11.